



第五章

掀起國民革命高潮

一九一九—一九二五年

TIEG200



孫中山傳

宋文翰題

歷史的轉折

一、十月革命、五四運動的影響

正當孫中山沉痛地回顧辛亥革命以來一再遭受挫折和失敗，發憤專心著書，苦苦地尋求新出路的時候，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

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列強共同控制中國的局面被打破了，對中國革命十分有利。一九一九年震驚中外的「五四」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包括了學生、城市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等廣泛的社會階層都參加到行列中，顯示著中國人民的覺醒，表明了辛亥之後中國社會的進步，國民革命的條件正在趨於成熟。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另一件意義深遠的大事——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從此使中國革命有了正確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更把中國革命引向了新的時期。

孫中山懷抱著救國救民的凌雲壯志，長期從事民主革命運動，又對社會主義學說，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及各國社會主義運動有相當深刻的瞭解，所以，他滿腔熱情地歡迎對革命有利的新變化。他迅速地對列寧領導的俄國社會主義革命表示真切同情和熱烈支持，並以深邃

的政治遠見，從十月革命中看到了新世紀的曙光，從而給自己帶來了「大希望」。蘇維埃國家誕生初期極其艱難的歷程，顯示著自身確是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可以信賴的盟友。他真誠地歡迎和嚮往這次革命，把它看成人類偉大希望的誕生，渴望從那裡找到推進中國革命的辦法。而對於五四運動，孫中山敏銳地發現這個運動具有不同於辛亥革命的新特點，更有力地啟迪、鼓舞和推動著他往前邁進的步伐。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九日，即十月革命爆發的第三天，在孫中山指導下的《民國日報》，就用大字標題率先做了報導，還不斷刊載讚揚和積極評價十月革命的文章。一九一八年元旦，又發表了歡迎十月革命勝利的社論，把這次革命視為希望所在。

孫中山站在民族主義者的立場上歡迎十月革命，希望革命後的俄國成為中國民族解放事業的真誠同盟者。儘管當時他對十月革命的性質和成就還缺乏深刻的理解，但對列寧及其人民頑強的鬥爭精神和勝利由衷欽佩。

當時，孫中山密切注視著蘇維埃國家的內外情況。他為了開闢革命新局面，開始考慮和蘇俄建立聯繫，一九一八年一月就曾指出：「此後我國形勢應注重於西北，若俄國現在之革命政府能穩固，則我可於彼方期大發展也。」¹三月時，又以同樣意圖囑咐四川靖國軍總司令、代省長黃復生，指出：「將來對俄關係，不可不預注意於西北邊。」²指示他出師西北，以打

1 邵元仲：《廣州護法日誌》，《建國月刊》第十二卷第六期，一九三五年六月。

2 《致黃復生囑討逆及對俄應注意西北邊電》（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三日），《國父全集》第五冊，臺北一九八九年版，第四十二頁。

通便於和蘇俄取得聯繫的通道。同年夏季，正當世界上各種反動勢力一致瘋狂地詛咒和誣蔑年輕的蘇維埃國家的時候，孫中山在上海卻代表南方國會親自給列寧與蘇維埃國家發去賀電，祝賀十月革命勝利，表示對俄國革命黨所進行的鬥爭「十分欽佩，並願中俄兩黨團結共同鬥爭」。³這份賀電表達了中國人民對蘇俄人民的友好和祝賀的心意，也表明了中國人民的覺醒和孫中山的進步。列寧見信後，高興地讚譽這封信為「東方的曙光」，他委託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齊契林覆信給孫中山，感謝他的賀電，向孫中山這位「中國革命的領袖」致敬，並強調共同進行鬥爭的必要性。⁴

孫中山的擁護者朱執信，對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也懷著嚮往的心情，對中國革命增加了勝利信心。他連續寫了多篇政論文章，如《革命黨應該如何？》、《匈俄蘇域政府的兵》、《兵的改造與其心理》等，站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立場上，熱情地讚頌列寧、布爾什維克和赤衛軍，並希望以當時蘇俄的勞動軍為榜樣，建立一支「有主義」的部隊。為此，他特地翻譯了列寧頒佈的蘇俄《勞動軍法規》，進行宣傳，還準備認真鑽研列寧的革命理論。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由北京學生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抗議巴黎和會繼續瓜分中國而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震驚中外，它不僅埋葬了巴黎和會與威爾遜之流所宣揚的「公理」、「永久和平」之類的謊言，也給正在進行的南北和議一個致命的打擊，南北軍閥此呼彼應地鎮

3 (蘇)葉爾馬舍夫：《孫逸仙》，莫斯科一九六四年俄文版，第二百一十一頁。

4 孫劍晨譯：《與孫中山交換的外交信件》，《史學譯叢》一九五八年第三期，原載蘇聯《國際生活》一九五七年第十一冊。

壓愛國學生運動，更進一步暴露了他們賣國虐民的嘴臉，擴大了他們同人民在爭取和平統一問題上的根本分歧。而孫中山則深受鼓舞和啟發，表示真誠的同情和支持。他盛讚愛國青年「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並「以革命思想為將來革命新事業之預備」，「實為最有價值之事」，熱烈地相信它「尚能繼續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

當五四運動爆發時，正值孫中山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後，避居上海，閉門埋頭著書立說，試圖從思想理論上啟發民智，喚醒多數人民。但他同時也關心社會政治現狀，指導國民黨人鼓動、組織民眾愛國運動。五月初，在上海民眾中正努力工作的國民黨人陳漢明函告孫中山說，南京

華僑學生代表大會議決：電請各方爭回青島，維持國權，請予贊助。孫中山見信後批示：「由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等校學生反對巴黎和會和日本攫取德國在山東侵略權益的示威遊行，「五四」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爆發。這一反帝愛國運動波及到全國各地。圖為北京學生示威遊行情景。

邵元沖代答獎勵：此間有一分之力當盡一分之力也。」據目前能見到的史料看，這是孫中山最早表述的要全力贊助五四運動的明確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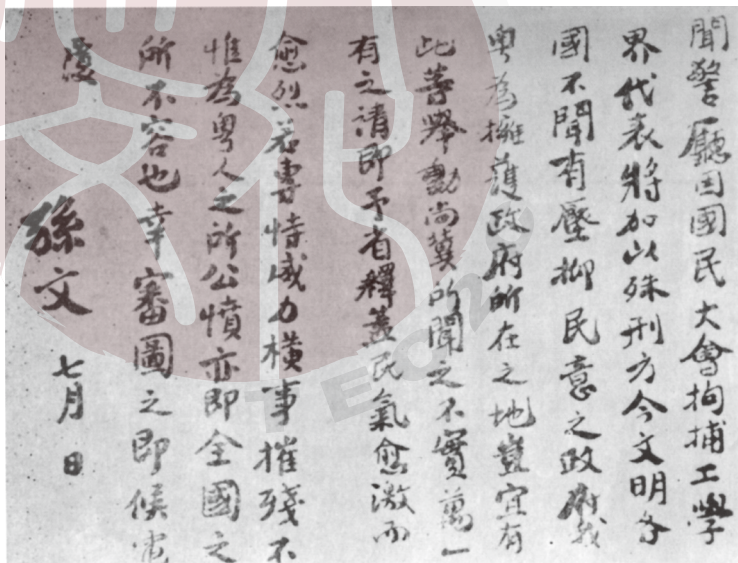
五月十二日，孫中山的秘書給陳漢明寫了回信。按照孫中山的意圖，首先讚揚了北京學生的愛國舉動，同時鼓勵陳漢明等國民黨人說：「此次外交急迫，北政府媚外喪權，甘心賣國，凡我國民，同深憤慨。幸北京各學校諸君奮起於先，滬上復得諸君共為後盾，大聲疾呼，足挽垂死之人心而使之覺醒」，此舉最有價值。接著，信中闡明了孫中山的態度：「中山先生同屬國民一分子，對諸君愛國熱忱，極表同情，當盡能力之所及以為諸君後盾。日來亦屢以此意提攜同人，一致進行。」信的最後又明確指示說：「尚望諸君乘此時機，堅持不懈，再接再厲，喚醒國魂。民族存亡，在此一舉，幸諸君勉力圖之！」⁵這封覆信，不僅明確表述了孫中山的態度，而且闡述了國民黨要人的主張，顯示出當時國民黨內對五四運動態度的高度一致性。這對眾多國民黨黨員來說，無疑將產生很大影響。

孫中山深深受到五四愛國運動爆發的鼓舞，他在上海多次接見全國學生聯合會代表，熱烈支持和鼓勵學生們的鬥爭，並參加了上海愛國學生的集會，在會上發表了熱情贊助學生運動的演說，還寫信給天津學生聯合會，讚揚青年學生的正義行動。

孫中山打電報給南北軍閥控制的政府，積極營救因參加愛國運動而受迫害的學生和被捕的

工、學界代表，對群眾的革命鬥爭採取歡迎和支持的態度。他及時營救遭北京政府逮捕的學生，在第一時間裡打電報給段祺瑞，要求「釋放被捕學生」。⁶由於孫中山的努力和其他各界人士的支持，特別是廣大群眾的團結鬥爭，北京政府被迫於五月七日釋放全部被捕學生。七月中旬，孫中山又通電廣東政府，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工人、學生代表，並指出：「蓋民氣以愈激而愈烈，若專恃威力，橫事摧殘，不惟粵人之所共憤，亦即全國之所不容也。」⁷譴責桂系軍閥支配下的廣東政府鎮壓革命群眾運動。

在一次群眾大會上，一個北京大學的學生在發言中，指名批評說：「孫中山先生的革命，



廣東學生與工人也參加了五四愛國運動，但受到當局的鎮壓。圖為一九一九年七月孫中山要求廣州當局釋放被捕工人和學生的電報。

⁶ 許德珩：《紀念與回憶》，《人民日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⁷ 黃季陸編：《總理全集》下冊，「電文」，成都近芬書屋一九四四年版，第一百六十四頁。

算不上革命。他的革命僅僅是把大清門的牌匾換作中華門，這樣的革命不算徹底，我們這次要作徹底的革命。」與會的孫中山聽了不但沒有生氣，而且帶頭熱烈鼓掌。會後，他還向該學生懇切地說：「我所領導的革命，倘早有你們這樣的同志參加，定能得到成功。」⁸五四後，北京等地學生紛紛成立學生聯合會，各地學生代表相繼集會於上海籌備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孫中山贊同學生組織起來，擴大學生運動。全國學生聯合會在上海正式成立，孫中山給予經濟上支持，並應邀到學生聯合會講演，他幫助學生分析巴黎和會，介紹十月革命情況，鼓勵青年鬥爭。這一時期，他還多次邀請學生代表到他的寓所談話，熱情地接見他們，讚揚青年的愛國熱忱，並對他們寄予莫大的希望。他曾語重心長地對代表講：「中國的希望就寄託在你們這般青年人的身上。」十一月十日，全國各界聯合會在上海成立，孫中山又派代表出席講話，支持群眾的愛國鬥爭。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孫中山對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給予高度評價。他在五四運動一個多月後，即六月十八日，就提出：「試觀此數月來全國學生之奮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蕩陶鑄之功！」⁹次年，即一九二〇年，他專向全黨發出以下的號召：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命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

8 金毓敏：《五四運動瑣記》，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三百三十一頁。

9 《覆蔡冰若函》，《孫中山全集》第五卷，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版，第六十六頁。

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倡同。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豔，各極其致，社會遂蒙受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撻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¹⁰

在中國，如此迅速地高度評價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孫中山應是第一人。而這也就是他後來重新考慮革命的道路和重新解釋三民主義以引起黨人思想變化的新契機。

孫中山充分肯定和讚揚五四學生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並給予熱情地支持，除他本人的言論、文字反映他的態度外，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間，他領導的如《民國日報》等報刊的許多言論，代表了他的意見和主張。尤其在「三罷」開始後的六月八日，戴季陶、沈玄廬、孫棣三等國民黨人創辦了《星期評論》週刊；同時，孫中山又委派朱執信、廖仲愷、胡漢民等國民黨要人開始籌辦《建設》雜誌，創刊號於八月一日問世。上述兩大刊物，較多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部分觀點和全民政治理論，影響之大，進步之程度，都是當時中國社會上不多見的。尤其是《星期評論》，創刊於「三罷」鬥爭中，注重鼓吹工農民眾的實際運動，對五四運動的深入發展和取勝，有直接推動作用。羅家倫在《五四的真精神》一文中說，孫中山「對

時代的適應和把握到底比別人高明而有魄力。所以新文化運動一發動，他就上海創辦建設雜誌，以積極的方案相號召，而令幹部同志辦星期評論，完全用語體文，俾與北大幾個有力量的刊物相呼應」。¹¹

五四愛國運動的發展，給孫中山以巨大影響。這種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越到後來看得越清楚，明顯地促進了他晚期思想的變化。

這些影響，表現在下述四個方面：

首先，五四運動促使孫中山進一步認清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反動面目，推動了他反帝反封建民主思想的發展。

孫中山在領導革命過程中，長期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辛亥革命時期，他發佈了對帝國主義妥協的《臨時大總統告友邦書》，希望以此換取帝國主義的同情和支持。「二次革命」時，他提出「聯日」反袁主張，幻想依靠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投靠英美帝國主義的袁世凱。護法鬥爭時，他又致函日本首相寺內正毅，勸告日本帝國主義不要支持「以武力破約法、毀國會」的段祺瑞，希望日本政府對中國能「表示援助正義之態度」等等。孫中山對國內封建勢力的認識，也是不明確的。辛亥革命時期，把鬥爭的矛頭僅僅指向清王朝，而沒有看到它所代表的整個地主階級，因此把革命果實讓給了袁世凱。袁世凱死後，又幻想通過與北洋軍閥政府

11 轉引自王德昭：《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

談判維護約法，恢復國會，實現共和政治，以及依靠一部分軍閥反對另一部分封建軍閥進行護法鬥爭。護法戰爭失敗後，孫中山被迫由廣州回到上海，這時他思想雖然十分苦悶，但他的「救國之心，未嘗少懈」。他開始專心著書，致力於革命理論的研究，總結經驗教訓，企圖從失敗中探索救國救民的新道路。他在《孫文學說》自序中回顧了民國以來的革命鬥爭，雖然認識到加強革命理論宣傳對於推行革命運動的重要作用，但是他並沒有總結出革命一再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改造中國的問題上，仍然認為護法鬥爭是唯一可行的道路。一九一九年五月，他在《護法宣言》中說：「須知國內紛爭，皆因大法不立。在法律，國會本不能解散，若不使國會復得完全自由行使其職權，則法律已失其力，……今日言和平救國之法，惟有恢復國會完全自由行使職權一途。」

可是，在北洋軍閥統治下，《臨時約法》早已被踐踏，所謂「國會」也已被摧殘，在這種形勢下，設想通過維護約法，恢復國會以實現「真共和」，豈不是與虎謀皮！

正當孫中山在探求救國真理的迂回艱巨進程中，五四運動爆發了。五四運動揭露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和反動軍閥的媚外賣國罪行，尤其是對日本帝國主義在山東問題上獍豸面目的揭露和巴黎和會騙局的戳穿，激起了全國人民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無比義憤，使人們認識到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五四運動使孫中山在總結不斷受挫的經歷的基礎上，進一步認清了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反動面目。他開始拋棄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幻想，認為日本帝國主義是侵略中國和東亞的罪魁禍首。他說日本政府「深忌中

國之強，尤畏民黨得志而礙其蠶食之謀，故屢助官僚以抑民黨，必期中國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¹²他譴責日本政府「專以援助反動黨排除民主主義為事」。明確地指出：「此後吾黨之患，仍在日本軍閥政策。」因此，他提出必須同日本帝國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他說，中國問題「解決的關鍵」就是「廢除二十一條款」。他極力反對中日直接交涉山東問題，主張必須以「抵制日貨及其他斷絕經濟關係之法」，對付日本。他號召革命黨人「一定要打到一個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條款廢除了，才歇手」。這充分表現了孫中山與日本帝國主義鬥爭到底的決心和勇氣。這一時期在他領導下的《星期評論》等刊物上，也對巴黎和會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認為和會是「強國的會議」，所標榜的「自由」、「正義」、「人道」、「民權自決」等等，都是「虛偽的宣示」，指出那些強國政治家的根本觀念，仍舊不外「強權即正義」，因此，靠「國際聯盟」來改造世界，則是「二種空想」。

孫中山對國內封建勢力的認識，也有明顯的進步。「五四」後，他連續發表了《改造中國之第一步只有革命》、《救國之急務》、《八年今日》等講演和文章。從這些言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他開始認識到中國革命的敵人不單是清朝皇帝、袁世凱、段祺瑞等幾個反動頭子，而是一個集團。他在批判過去革命的不徹底時說：「八年以來的中華民國，政治不良到這個地位，實因為單破壞地面，而沒有掘地底陳土的緣故。」他說這些陳土就是官僚、軍閥和政客。

他沉痛地追述了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現實社會是破壞「一專制政治」，而「有三專制政治起而代之」。他進而指出：中國禍亂的根源在於政客、官僚和軍閥的「搗亂」，「政客不死，禍亂不止」。「要建築燦爛莊嚴的民國，須搬去這三種陳土，才能建立堅固的基礎來。」他把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了中國反動政治集團。孫中山認識到中國革命的敵人是一個反動集團，這是他反封建民主思想發展過程的一個飛躍。

基於上述認識，他提出「根本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是革命。關於如何救中國，孫中山在一次對學生講演中分析了流行一時的「教育救國」、「實業救國」和「地方自治」等主張，他認為不打下倒腐敗的官僚統治，想從教育、實業以及地方自治入手改造中國是辦不到的。對於「教育救國」，他說：「假使我們培養一個青年，費巨額金錢，俾受一種完全教育，官吏有時竟因嫉視新人物的心理置諸死地」，因此，「教育救國」不行。興辦實業也不行，他說：「辛亥以後，多數華僑，熱心回國經營實業，因官吏索賄過重，致中途灰心。從這點看，從實業上改造起，也是沒有希望的。」至於「地方自治」，更不行。他指出：「現在官僚，何嘗願意人民有自治的能力？大家只需看地方自治經費，統被他們揮霍盡淨，致自治不能舉辦。」他認為「以上三種，固是改造中國的要件，但不能認為是第一步的方法」，第一步的方法，「只有革命」。即「南北新舊國會一概不要它，同時把那些腐敗官僚、跋扈武人、作惡政客完全全掃乾淨它……重新創造一個國民所有的新國家，比現在的共和國家還好得多」。孫中山此時開始改變救國的方法只有「護法」一途的觀點，認為救國「所可采者惟有兩途」：一為

「維持現狀」，即恢復合法國會，「令它自由行使職權」；一為「根本解決」，即「重行革命」。並且他逐漸對「護法」產生懷疑。他說：「護法一途，已有步步荊棘之象」。而且「護法斷斷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因為「護法不過矯正北政府之非法行為，即達目的，於中華民國亦無若何裨益。況護法乃國內一部分問題，對內仍承認北京政府為中央政府，對外亦不發生國際上地位之效力」。他因此努力建立「正式政府」，重新開始革命事業，以求根本改革。

五四運動促使孫中山開始認識到帝國主義與封建統治集團互相勾結的密切關係。辛亥革命前，孫中山雖然已經清楚地看到中國所面臨的「強鄰環列，虎視鷹瞵」的危險局面，他卻把這種局面的出現完全歸罪於清王朝統治的無能。他認為如果中國人「發奮自雄」，打倒腐敗清王朝統治，「西人將見好於我不暇，遑敢圖我。」可是清王朝被推翻後，中國的形勢並沒有好轉，而且比清朝時更壞。正如孫中山所說：「夫去一滿洲之專制，轉生出無數強盜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他對這種局面感到十分痛心，但是卻沒有認識到這正是帝國主義



佩吳軍閥直系與張作霖由於與直系軍閥吳佩孚的矛盾，於一九二二年初主動與張討伐吳佩孚的孫中山接近。圖為張作霖。

大總統賜覽



一九二二年春，張作霖之子張學良呈贈孫中山的題照。

分裂政策的結果，是帝國主義勾結中國的封建勢力聯合統治中國造成的。五四運動後，由於群眾對帝國主義本質和軍閥賣國罪行的揭露，孫中山在總結革命多次失敗的基礎上，逐漸認識到北京政府完全是被帝國主義控制的賣國政權。他說：「此等軍閥已完全為要求此賣國條約之勢力所支配。」而且這個政權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得到帝國主義的支持，他們之間是「主子」和「奴才」的關係。他說：「列強仍然在政治上和財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軍閥。其中有一個是過去的胡匪頭子，叫張作霖。他名義上是滿洲軍隊的統帥和督軍，但實際上是北京『政府』所聽命的主子。而他本人卻又在一切重大的、與日本有關的事情上聽命於東京。因此，可以正確地斷言：在與日本切身利益有關的一切重大政策問題上，北京實際上是東京

的工具。」¹³

由上可見，孫中山此時雖然還沒能從本質上認清帝國主義和中國的封建勢力，因而沒有也不可能提出反帝反封建的綱領，然而，五四運動卻使他對中國革命的某些基本問題產生了新認識，這些都為他後來接受共產黨的幫助，拋棄對帝國主義的幻想，走上堅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準備了條件。

其次，五四運動促使孫中山開始改變他的群眾觀。

孫中山長期以來進行革命活動的主要方式是在有限的群眾範圍內搞單純的軍事暴動。和所有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一樣，他不能依靠廣大勞動群眾，認為他們都是「不知不覺的人」，只能做「最簡單的事」的「阿斗」。因此，他從來沒有想以勞動人民為主體進行革命鬥爭，他所依靠的是少數「先覺之士」。辛亥革命運動中，雖然也曾發動和聯繫過會黨和新軍，這也只是因為「先知先覺之士」的「發明」必須有「不知不覺者」的「竭力樂成」，「才能夠做成功」。因此，武昌起義成功後，各地普遍發生了魯迅通過阿Q所說的「革命黨人不准人民革命」的事情。「二次革命」、護國反袁戰爭中，由於單純軍事暴動不斷遭到失敗，他又依靠西南軍閥進行護法鬥爭。可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不依靠廣大工農群眾，是無法打倒奴役

13 《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百三十五頁。

中華民族、推行封建專制政治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正如列寧所說：「要革命，但又不進行『群眾性的革命鬥爭』，這是不可能的。」孫中山就是既不能發動廣大勞動群眾，又要建立獨立、民主、自由的中國，這就成了他所領導的革命一再失敗的根本原因。直到五四前，他曾多方面總結過失敗的原因，但始終沒有認識到脫離廣大農工群眾是使革命屢遭失敗的根本原因。

五四運動中，英勇的青年學生和工人群眾走上街頭，他們以新的方式、新的規模向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展開了堅決的鬥爭，形成了全國規模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風暴。尤其是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顯示了巨大的革命威力，震撼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迫使反動政府不得不罷免三個賣國賊的官職，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群眾運動的革命浪潮激蕩著整個中國，也給孫中山以很大震動。他從群眾堅決反帝反封建鬥爭中受到鼓舞，看到了人民群眾的力量，他開始重視群眾性的政治鬥爭。「六五」上海工人大罷工，立即引起孫中山的注視。六月二十二日，他和戴季陶的談話中雖然說「工人沒有知識」，但要用「三民主義的精神」去「指導他們」，「要做指導社會的工夫」。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他應邀出席上海機器工會成立大會，並發表講演，鼓動工人「欲貫徹民生主義，非在官僚手中奪回民權不可」。對青年學生運動，尤為重視。他說：「試觀今次學生運動，不過因被激而興，而於此甚短之期間，收絕倫之巨果，可知結合者即強也。如使諸君即時以正當方法結合，要求在國會政治之下，回復諸君自己之權，吾

敢斷言諸君之必成功也。」¹⁴ 他從學生運動中看到了組織起來的強大力量，並進而想藉助群眾運動的力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他說：「若諸君於此舉足輕重之際，來助我主張，余信北京政府從此不能更拒絕吾人也。」¹⁵ 一九二一年，孫中山第二次回廣州重組政府後，更注意推行保障人民權利的政策，一月二十三日，廣東軍政府下令廢止鎮壓人民的《治安警察條例》。孫中山對廣東工人運動表示贊助。四月十八日，他在廣東教育會對工人發表演說，闡明民生主義應恢復工人人格及增進工界幸福。由於孫中山的同情和支持，廣東一時成為全國工人運動最活躍的地區，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得以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這一時期，他對被北京政府迫害的教師表示十分同情。一九二一年六月七日，他致函北京八校被迫辭職的教職員，指出：「在偽政府之下，決無教育發展希望，沉復摧殘至此」，並歡迎全體來粵。事實表明，五四運動促使孫中山對待群眾和群眾運動的態度開始了可貴的轉變。

值得提出的是，在孫中山的戰友中，朱執信比當時一般資產階級革命派看得更遠一些，他不但提出了「國家之中最有力者為人民，人民所歸向者，始謂之實力」¹⁶ 這一卓越的見解，而且隨著時代革命思潮的影響，逐漸認識到來自下層革命群眾的力量。他說：「我以為中國的革命是難免的。工人的力量是一天增加一天。」又說：「離了農工的幫助，學界也沒有真

14 《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十七頁。

15 《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十七頁。

16 《所謂實力派之和平》，《朱執信集》下冊，上海建設社一九二一年版，第五百四十一頁。

「正的力量。」¹⁷他把日益增長的「工人的力量」，視為中國革命「難免」的因素。他發出「運動鄉下人愛國才有用」的呼聲，鼓勵青年學生到農村發動農民參加愛國運動。他還讚揚當時革命知識分子參加「打倒孔家店」的鬥爭。當然，他用以觀察和論述社會問題的基本觀點，仍然沒有超越民主主義思想體系。

孫中山對朱執信是極為贊佩的，長期倚為重要助手。朱執信的這些進步的思想言論，對於孫中山的群眾觀自然也會產生一些積極影響。

再次，五四運動推動孫中山更重視革命理論宣傳工作。

「五四」前，孫中山在《孫文學說》自序中，已經闡明了加強革命理論宣傳的重要性。他認為民國以來的建設「所以一無成就」，重要原因之一「是革命黨人於「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信仰不篤，奉行不利」，受了「知易行難」錯誤理論的影響。他說：「知易行難」之說，「余生平之大敵也！其威力萬倍於滿清。夫滿清之威力，不過只能殺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奪吾人之志也。乃此敵之威力，則不惟能奪吾人之志，且足以迷億兆人之心也。」他認為正是這種錯誤思想作祟，瓦解了人們的鬥志，從而使革命後的建設事業「一敗塗地」。因此他在第一次護法失敗後，奮筆疾書，批判「知易行難」理論，提出「知難行易」學說與之相對立，期望以此學說武裝人們頭腦，「以破此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思想迷津」，「清除革命黨人畏難情

17 《野心家和勞動階級》，《朱執信集》下冊，上海建設社一九二一年版，第六百六十六頁。

緒，振奮革命精神，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

五四運動爆發，促進了他這一思想的發展。孫中山沒有認識到五四運動發生的深刻的經濟、政治背景，而認為運動之所以爆發，完全是由於新思想作用的結果。他說：「此數月來全國學生之奮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蕩陶鎔之功？」¹⁸進而提出：「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這種看法固然是片面的，然而他看到了新思想的宣傳對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則是一大進步。因此，孫中山在五四後，一方面堅持撰寫《建國方略》，希望以革命理論「啟發國民」，建設真正的民主國家；另一方面則積極創辦刊物。一九一九年六月間，他派戴季陶、沈玄廬等人創辦《星期評論》、《民國日報》副刊《覺悟》，和北京出版的戰鬥性很強的《每週評論》等期刊相呼應。八月，又派朱執信、廖仲愷等創辦《建設》雜誌。孫中山還親自為《建設》雜誌寫《發刊詞》指出：「八年以來，國際地位猶未能與列強並駕，而國內則猶是官僚舞弊，武人專橫，政客搗亂，人民流離者，何也？以革命破壞之後，而不能建設也……故發刊『建設雜誌』，以鼓吹建設之思潮，展明建設之原理，冀廣傳吾黨建設之主義，成為國民之常識。」¹⁹五四運動，推進了孫中山進一步重視思想理論宣傳工作。

最後，五四運動促進孫中山對社會主義蘇聯的嚮往。

五四運動，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爆發的。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

18 《孫中山年譜》，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第二百四十三頁。

19 《建設》，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版，第一卷第一號。

壓迫民族指明了解放的道路。十月革命後的第二天，蘇維埃政權就宣佈廢除帝俄時代同被壓迫國家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一九一八年二月，又宣佈廢除中俄不平等條約。這些政策給一向被帝國主義奴役壓迫的中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也給正在尋求民族解放的孫中山以巨大影響。他歡迎十月革命，把它看做人類解放的偉大希望。孫中山渴望發展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早在一九一八年一月間就指出：「此後我國形勢，應注重於西北。若俄國現在之革命政府能穩固，則我可於彼方大期發展也。」²⁰為了表示對俄國革命的祝賀，一九一八年夏，孫中山致電列寧和蘇維埃政府，電報中說：「中國革命黨對貴國革命黨所進行的艱苦鬥爭表示十分欽佩，並願中俄兩黨團結共同鬥爭。」²¹

五四運動後，先進的知識分子廣泛傳播馬列主義和十月革命的經驗，尤其是一九一九年七月和一九二〇年九月，蘇俄政府兩次對華宣言，重申廢除沙俄時代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並建議在平等基礎上建立兩國外交關係，更使孫中山感到唯有俄國「能以平等條件待遇中國」。他讚揚十月革命，敬仰列寧，注意學習俄國革命經驗。一九二一年八月，他在覆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信中熱情地表示：「我希望與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獲得私人的接觸，我非常注意你們的事業，特別是你們蘇維埃的組織，你們軍隊的教育的組織。」並表示向「列寧以

20 邵元沖：《廣州護法日誌》，《建國月刊》，第十二卷第六期。

21 《孫中山年譜》，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第二百三十頁。

及所有為了人類自由事業而有許多成就的友人們致敬」。²²他決心以蘇俄為榜樣，建立新式共和國，他說：「法、美共和國皆舊式的，今日惟俄國為新式的，吾人當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國。」²³五四運動對巴黎和會騙局的揭穿，從反面教育了孫中山，使他開始丟掉對帝國主義的幻想；五四運動後十月革命經驗在中國的流傳以及蘇俄政府對中國人民革命的支持和援助，則從正面給孫中山以啟示，使他更嚮往社會主義蘇聯，並終於形成了孫中山關於中國革命必須「以俄為師」的觀念。

總之，五四運動對孫中山的影響是巨大的，集中於一點就是開始動搖了他在中國建立西方資產階級共和國的信念。如果說一九二四年，他在總結多年革命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由於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終於丟掉了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幻想，拋棄了西方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實現了他一生中偉大的轉變，那麼，五四運動則是他這一轉變的最初起點。

孫中山從五四運動受到深刻影響開始，到實現三民主義的新發展，說明了一偉大人物之所以偉大……而是因為他所具備的特點使他最能為當時在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影響下產生的偉大社會需要服務」。²⁴這也完全符合孫中山主觀的願望和努力，「順乎天理應乎人情，合乎

22 《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百三十六頁。

23 《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百三十八頁。

24 「俄」普列漢諾夫著，王蔭庭譯：《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一〇年版，第五十五頁。

世界之潮流，本乎人群之需要」。

孫中山的思想所發生的這些新變化，實際上正是他在反思和探索中對自己過去革命活動的缺陷的發現和拋棄。他就是這樣自覺地接受實踐的檢驗，並從而改進和提高自己的。孫中山繼續前進了。

二、革命思想的重要發展

陳炯明的叛變，促使孫中山總結第二次護法鬥爭的經歷，進一步思考了中國革命的途徑、目標等重要問題，並在已有認識的基礎上又有前進。陳炯明的叛變，使孫中山對依靠少數人再走護法的老路不再抱有希望。同時，在北洋軍閥的支持下，舊國會在天津重新召集會議，公開為北洋軍閥幫腔的舉動，也使孫中山下決心拋棄護法主張，改用革命手段解決國內問題。

孫中山對帝國主義及其與中國革命的關係，也有了新的認識。第一次護法失敗時，孫中山已看到反動軍閥是中國的禍患，但他對站在軍閥勢力背後的更大禍害——帝國主義，看得仍不那麼清楚。五四運動發生後，群眾強烈的反帝情緒，感染了孫中山，他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野心和他們與中國反動勢力的關係，已有比較清楚的認識，態度也變得強硬起來，但這主要還只是限於日本。對英、美等國，孫中山仍抱有幻想。但以後的現實，卻使孫中山大失所望。當他就任非常大總統時，港英當局竟然阻撓群眾集會慶祝和捐款支持新政府。英、美等國拒絕承認孫中山領導的廣州政府。而在段祺瑞之後控制了北京政府、繼續與孫中山為

敵的以曹錕、吳佩孚為首的直系軍閥，卻受到英、美的多方支持。為了解決北伐軍所需費用，孫中山曾要求列強將粵海關關餘（指扣除償付賠款、外債後的關稅餘款）撥付廣州軍政府，但外國駐華使團以孫中山領導的軍政府權力只及廣東為藉口，予以拒絕，並將保管的關餘二百五十萬兩劃歸北洋政府。孫中山針鋒相對地作出反應，準備收回海關。港英當局聞訊，公然派遣炮艦抵粵巡弋，以武力相威脅。與孫中山離心離德的陳炯明部，則袖手旁觀，拒不聽從孫中山的領導，致使這次關餘之爭不了了之。這些嚴酷的現實，促使孫中山對英、美的認識有所轉變。總的說來，這一時期孫中山對帝國主義與中國革命關係的認識，基本上還處於感性認識階段，對公開支持北洋政府與革命力量為敵的日本政府，孫中山的認識已相當深刻；而對敵對立場尚不那麼明顯的英、美等國，孫中山的認識還是比較模糊的。儘管孫中山對帝國主義的本質還缺乏全面的認識，還沒有清楚地意識到要拯救中國，首先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但是他

他在當時的一些言行，特別是他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揭露與抨擊，表明他在帝國主義與中國革命關係的認識上，已經有了很大的前進，隨著鬥爭的開展和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共產黨代表馬林在廣州，由專程赴孫中山處，介紹雷仲平、林直、李劍光、張太、林會、山組、武裝、學校。

英、美等國政府破壞中國革命真實面目的日益暴露，孫中山的認識在繼續提高。

孫中山對學習蘇維埃俄國和爭取得到蘇俄的幫助，以推進中國革命開展的態度更加堅定。

十月革命發生後，孫中山立刻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但對它的瞭解還很少。到一九二〇年，情況有所變化。一是年初外國干涉十月革命的軍隊在俄國人民的抗擊下，被迫從西伯利亞撤退，遠東共和國在赤塔成立，改變了蘇俄同中國原來那種阻隔的狀態，使孫中山有可能對蘇俄的真實情況有更多的瞭解。二是這年的九月

二十七日，中國收到了蘇俄的第二次對華宣言，鄭重宣佈放棄沙俄政府在中國攫取的一切侵略權益。這對極端憎恨外國帝國主義把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中國的孫中山，自然有巨大的吸引力，使他對蘇俄產生更多的親近感。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中國共產黨人張太雷陪同下，在桂林與孫中山進行了三次長談，向孫中山較詳細地介紹了蘇俄的情況，其中包括從戰時共產主義到新經濟政策的重大轉變。這使孫中山對蘇俄的瞭解，更加深了一步。不久，他明確表示打算與蘇俄建立關係。但蘇俄距離廣東畢竟太遠，而華南和長江流域卻是英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孫中山顧慮過早與蘇俄建立關係會激怒英國，於革命不利，打算待北伐軍佔領漢口後再正式承認蘇俄。以後，當孫中山對英、美等國政府尚存的一點幻想一破



張太雷與孫中山會談時陪同馬林的張太雷。

滅，他便堅定地公開地作出了聯俄的決定。

孫中山在革命鬥爭中，開始注意發揮人民群眾特別是工人群眾的力量。過去，孫中山的追隨者中也有不少工人，但他對中國的工人運動卻沒有表現出多少熱情。這一方面固然由於獨立的工人運動還沒有發展起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孫中山對下層群眾政治覺悟的保守估計。一九二二年初掀起的規模空前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引起孫中山的重視。這次大罷工最初雖由增加工資、改善待遇等經濟要求所引起，但很快就將鬥爭的矛頭集中指向外國帝國主義。當時正在桂林準備北伐的孫中山，積極給予了支持，並要廖仲愷在廣州籌款支援。同年五月一日，許多共產黨員參加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並舉行了有廣州數萬工人參加的大遊行。這些都對孫中山的思想產生了影響。在馬林同孫中山的會見中，兩人曾討論了群眾運動和在工人群眾中進行宣傳的必要性等問題。說明這個問題在孫中山思想上逐漸佔有重要的位置。孫中山因陳炯明叛變而抵滬後，曾有三十一個工會團體的代表前往拜訪，表示聲援，兩者間的關係進一步密切。

孫中山思想的這些引人注目的發展，是繼十月革命、五四運動以後他對中國革命一系列重要問題重新認識、思考的結果，也反映了他對革命實踐的及時總結。同時，這些發展也得到他周圍一些國民黨人的推動，實際上也反映了廖仲愷、朱執信等相當一部分居於領導地位的國民黨人的思想發展歷程。基於上述認識，孫中山等人對一九二一年成立後即積極組織人民群眾開展反帝反封建鬥爭的中國共產黨人抱有好感，並開始考慮通過採取國共合作的方式，恢復和增強國民黨的活力。孫中山在桂林時，曾與陪同馬林前往的中國共產黨人張太雷詳細

討論了如何動員中國廣大青年更加積極地參加革命運動的問題，希望在這項工作中能得到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表示了願與中國共產黨人合作的積極態度。

正是經過了較長時間的瞭解、比較和思索，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影響和推動下，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一批國民黨人，開始樹立了改變以往的鬥爭方式，走新的革命道路的願望。陳炯明的叛變和第二次護法運動的失敗，促使他們最終下了決心。與此同時，蘇俄、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在經過一段曲折後，對孫中山和他所領導的中國國民黨，也有了符合實際的正確認識。於是，蘇俄及共產國際與孫中山的接觸開始增多。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也作出了國共合作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一些基本問題的認識，還是相當幼稚的。一九二一的黨的第一份決議中，曾規定「只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係」。但孫中山等民主革命派的救國熱忱和不懈努力，以及蘇俄及共產國際與孫中山的日益接近，促使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有了新



一九二二年八月，中國共產黨委派李大釗到上海與孫中山商議談改組國民黨事宜。圖為李大釗。

的認識。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共產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對於時局的主張，認為「依中國政治經濟的現狀，依歷史進化的過程，無產階級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還應該聯絡民主派共同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以達到軍閥覆滅、能夠建設民主政治為止」。陳炯明叛變事件發生後，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更明確地表示了支持的態度。七月發表的中國共產黨的「二大」宣言明確指出：「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勢力和民主主義的革命勢力合同動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義革命格外迅速成功。」八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舉行特別會議，通過了國共合作的有關決定。

也是在八月下旬，孫中山在上海會見了李大釗，就這樣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的問題，進行了多次深入的討論。孫中山非常感謝中國共產黨人的真誠幫助，對李大釗豐富的學識和關於中國革命的卓越見解十分欽佩。兩人「暢談不倦，幾乎忘食」。一天，送走李大釗後，孫中山興奮地對宋慶齡說，共產黨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在今後的革命鬥爭中他能夠依靠他們的明確的思想和無畏的勇氣。他誠摯地希望李大釗加入國民黨，幫助他一起完成通過振興國民黨來振興中國革命的任務。在孫中山的熱情邀請下，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和張太雷等一批中國共產黨人，先後以個人名義加入了國民黨，為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提供了條件。孫中山的革命生涯，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三、完善三民主義

一九一九年，孫中山根據革命形勢的發展和需要，對所宣導的三民主義的內容予以豐富

和發展。他撰寫的《三民主義》一文，雖僅是一個概要，內容卻簡明扼要，是他第一次對三民主義作了較前更深入系統的理论說明和界定，進一步完善了「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是孫中山的革命理論，也是他在民主革命階段政治思想的基本內容。民族主義所宣佈的目標，在辛亥革命前，是要通過武裝鬥爭，推翻腐朽賣國的滿清貴族集團所把持的清朝反動統治，重建漢族人當權的政府。也就是說它的主要內容就是反滿，因此被人稱之為「反滿民族主義」。經過民國建立後的多挫折，孫中山對民族主義有了新的理解與認識，那就是對外民族自求解放，擺脫列強的瓜分和統治，對內中國境內各民族則一律平等。他倡導種族融合以形成近代國家的大民族的問題，並舉美國為例，說明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為一個國家的民族，是民族發展的必然。他認為，中國「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以誠，合為一爐而冶之」，也應實行民族大融合，「以成中華民族之新主義」。只有如此，方是達到「民族主義的積極目的」。²⁵

民權主義是三民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它所宣佈的目標，在辛亥革命前，是要剷除封建君主專制政治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經過十餘年在歐美諸國參觀訪問的豐富閱歷，孫中山在總結革命經驗時對民權主義理論的闡述，隨之進一步深入。他說：「民權者，民眾之主權也。」指出人民享有主人應有的權力，民權日益發達，乃是「世界進化之潮流，而非人力所

能抵抗者」。十分贊同美國林肯所說的：「為民而有、為民而治、為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也。」認為「有如此之政府，而民者始真為一國之主也」。²⁶

孫中山自創了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和監察權的「五權憲法」，又參照瑞士的「直接以行民政」的憲法，提出「國民有選舉之權，有複決之權，有創制之權，有罷官之權，此所謂四大民權也。人民而有此四大權也，乃能任用官吏，役使官吏，駕馭官吏，防範官吏，然後始得稱為一國之主而無愧色也」。²⁷

民生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歸宿。孫中山認為民生問題，「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因此它就是社會問題。在辛亥革命前，它所宣佈的目標，是用「平均地權」的辦法，以防止資本主義制度下貧富分化的對立。到一九一九年時，孫中山對貧富日益懸殊的根源，認識更為深刻，進一步強調「中國之行民生主義，即所以消社會革命於未然也」。並提出中國革命的思想預防的辦法是：「防止少數人之壟斷土地、資本二者。」²⁸

孫中山的主義和理想的最終目的，是要建設成爲一個強盛發達的中國，進而促使人類成爲一個大同世界。

26 黃彥編：《孫文選集》中冊，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十一月版，第六百一十五頁。

27 黃彥編：《孫文選集》中冊，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十一月版，第六百一十七頁。

28 黃彥編：《孫文選集》中冊，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十一月版，第六百二十一頁。